臺灣文學研究集刊　第三期
2007年05月　　頁85~108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狼》、《鐵漿》、《破曉時分》中的人物與朱西甯之離散情結探析

侯　如　綺*

摘　要

由於朱西甯自大陸來臺之離散經驗的作用以及揮發，影響其三本小說合集《狼》、《鐵漿》、《破曉時分》情節的創作。各篇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雖有差異，但總會出現一個人物角色 A 來完成相同的情節功能。人物 A 在小說中擔負了刑罰或折辱，因此產生推動情節的作用。而究其人物內涵，實扮演了類似基督「代贖」者的角色；這一份「代贖」的內在精神，也正與儒家良知之說相互契合。朱西甯從這些人物角色的關係之中，反覆描述中國人的道德意志力與惡劣環境抗爭、掙扎以及努力的圖景，並強調中國人堅韌善良的人格品質，這除了是表露他對於儒家理想人格以及對基督救贖精神的渴望外，也安慰了他對自身離散命運的焦慮。

關鍵詞：朱西甯　人物　漂泊離散　情節功能

96.3.29 收稿，96.4.30 通過刊登。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及兼任講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朱西甯出身軍旅，二十歲隨國民黨軍隊來臺，在國共尚且尖銳對峙的年代，他以流離的經驗，揭露共黨罪惡，高舉反共旗幟，熱情澎湃的寫下反共小說《大火炬的愛》。在反共作品之後，朱的作品便轉以「懷鄉」爲創作基調。

自五〇年代中期至六〇年代中期，他出版了代表作《狼》[1]、《鐵漿》[2]以及《破曉時分》。[3]弔詭的是，這些被稱之爲懷鄉的作品，卻陸續被研究者指出朱西甯鄉土小說筆下的故鄉已經「與現實中的時空完全斷裂、不再有聯繫」[4]、是「在文本中建立一個有別於國共政治實體的想像世界」，[5]或說其筆下的鄉土實是「生命救贖或沉淪的試煉所」。[6]作家所懷念的故鄉，已經不是具體實際的，而是心靈想像所編織的圖像。

從反共小說到鐵漿時期的懷鄉小說，筆者認爲，這並不代表朱西甯的小說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越離越遠，而是它們是以微妙的關係在聯繫著。此間的關係正透露在懷鄉小說《狼》、《鐵漿》與《破曉時分》中相同的情節功能中。各篇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雖有差異，但是總會出現一個人物角色來完成相同的功能。作者爲何對於如此的情節功能及人物角色、關係如此執著、關注？本文以探索此情節功能下的人物作用與內涵爲進路，並因此發現作者乃藉由相同的情節作用，寄託自身對於中國人的理想和願望。

本文分爲三個層面，一先歸納人物角色所產生的情節功能，二是自此情節功能探討人物角色塑造的意義，最後將《狼》、《鐵漿》、《破曉時分》中以臺灣爲背景的作品與大陸鄉土爲背景的作品作參照，思考在離散漂泊至異鄉的現實狀態中，作者是在何種創作心理下書寫了這三本小說。

二、《狼》、《鐵漿》、《破曉時分》中的情節功能

對於人性的探討是朱西甯作品的重要關懷，此一論點，已經是研究者之定

---

1 初版為大業出版社，1963.2。
2 初版為文星書店，1963.11。
3 初版為皇冠出版社，1965.10。
4 楊政源，《家太遠了——朱西甯懷鄉小說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6），頁 113。
5 江衍宜，《「細述」衷情——朱西甯小說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6），頁 59。
6 王德威，〈鄉愁的超越與困境——司馬中原與朱西甯的鄉土小說〉，《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國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6），頁 2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或如張素貞之說，貫串其作品的主線，是「深入探討人性的複雜矛盾，愚拙脆弱，有意無意留下悲憫的感喟」[7]、或如王德威之說，「朱西甯搬演鄉野景觀，使之成爲人性掙扎、欲望消長的舞臺」[8]，都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說法。

也因此小說人物便成其筆下探討人性的寄託，鄉土舞臺則是他演繹人性總總可能的場景。從他的小說人物來觀察，尤可見到作家對人性的看法與期許。論者柯慶明評論《鐵漿》即指出朱西甯塑造人物的共同性：

> 洋溢在〈鐵漿〉這一本短篇小說集中的是一片悲劇氣息，而且大部分說來都具有古希臘悲劇的意涵，一種或者可以稱作血氣英雄的人物與命定環境的抗衡，構成了朱西甯小說中的「動作」中心。這類英雄共有的特徵是一種血氣之勇的執拗。他們是「不服氣者」。是憤怒的青年人或是中年人。是好管閒事者，或是想入非非者。它們通常都夠得上稱為「漢子」，不論是因為軀體的強健、或者是膽識的非凡。[9]

人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與鄉俗傳統的約束，與之對抗、掙扎，以生存展現了強韌的生命力和人的尊嚴。由於他們不能達到如悲劇英雄一般自我超拔的境界，多爲血氣之勇，所以只能稱爲血氣英雄而非英雄。其後關於人物的討論與論點都有類似的觀察。不只是《鐵漿》這篇短篇小說集，包含在此之後所創作的鄉土小說人物皆爲如此。陳芳明亦認爲朱之小說中的人物大多是以「反英雄」的角色出現，是有時會使些小奸小壞的尋常老百姓，但又會在小說中投射出一絲人性的曙光。總之，是「不完全悲劇英雄」[10]。

在朱的筆下所帶有的人物共同點，我們無妨從另一個角度觀察。筆者企圖自文本的情節功能去觀看血氣英雄或不完全悲劇英雄的產生。方法上參考普羅普處理民間故事的分類方式：普羅普在所收集到的一百個俄國童話故事中得到一個規律，即雖然一個故事中的人物可以變動，但它們在故事中所發揮的功能卻是永恆和有限的。普羅普這麼描述：「功能指的是從其對於行動過程意義角

---

[7] 張素貞，〈試探朱西甯小說的主題意識〉，《細讀現代小說》（臺北：東大圖書，1996.2），頁 83。

[8] 王德威，〈畫夢紀——朱西甯小說藝術與歷史意識〉，於朱西甯著《現代幾點鐘：朱西甯短篇小說精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1.1），頁 226。或見王德威，〈鄉愁的超越與困境——司馬中原與朱西甯的鄉土小說〉，《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國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6），頁 280。

[9] 柯慶明，〈論朱西甯的一本短篇小說集：鐵漿〉，《境界的再生》（臺北：幼獅 1977.5），頁 404。

[10] 印刻出版社 2003 年所重新整理出版之「朱西甯作品集」之〈編輯說明〉中之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度定義的角色行爲。」[11]而人物的功能在故事中起著穩定、恆常的作用，不管它們是由誰和怎麼具體體現的。它們構成一個故事的基本成分。[12]

所以在分析情節的敘事功能時，將著眼於角色故事中的功能。功能是由角色和角色的行動所構成的，所以在分析時我們暫且不能把重點放在人物的性格特徵上，而是應當放在行動所產生的意義和作用上。[13]

朱之小說雖多是採複合序列，但是仍可從小說人物的行動所產生的功能，發現其人物功能所具有的共通之處。在其鄉土小說中，常見一事件人物A在事件發展到極致不可突破之時，由人物A的行動，而有所轉機、結束、或者莫可奈何的接受。人物A擔負著承擔的功能，由人物B來執行，他們所擔負的，多是誤會、責罵或者肉體傷害。有因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者，也有因此損身害命者。他們可以選擇承擔這些對他們己身造成傷害之事，或者選擇不承擔。不過在作者的安排下，他們大多選擇承擔。選擇了承擔之後，會有一人物C因而得到好處，或者因此內心有所醒悟以及心理掙扎等。但是也有靈光未開，混沌未明者，不會因人物承擔所受傷害而有所動，仍然泅泳於人性的惡處或者陷溺在本身的性格缺陷中。以下以表格方式突顯之：

小說	人物 A	人物 B	人物 A 行動	人物 C
〈賊〉	魯大個兒	瓦房家	承擔枉誣打罵	狄三
〈劊子手〉	漢子	縣老爺、傅二畜	承擔死刑	傅二畜等
〈紅燈籠〉	老舅	人腳獾、甯家	承擔救人而發病欲亡	我
〈出殃〉	三奶奶	老爺	承擔枉誣自殺	徐三
〈鎖殼門〉	長春	大春	承擔秘密而亡	永春、大春
〈鐵漿〉	孟昭有	生鐵師傅、孟昭有	承擔飲鐵漿而亡	孟憲貴
〈狼〉	大轂轆	二叔、二嬸	承擔枉誣	我、二嬸
〈冷雨〉	三招姐	楊二倌	承擔失節之秘密	三招姐之母
〈白墳〉	二叔	我的家人	承擔枉誣譏諷	我及家人
〈偷穀賊〉	穀雨	姜大麻子、黎三	承擔枉誣打罵	駱大嫂
〈牧歌〉	大馬	姓廖的二毛子	承擔刑罰	二馬、大馬奶奶
〈破曉時分〉	徐周氏、戴姓商人	縣大爺、黑八	承擔刑罰（非自願）	我

[11] 弗拉基米爾・亞可夫列維奇・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11），頁 18。

[12] 羅伯特・休斯（Robert Scholes）著、劉豫譯，《文學結構主義》（臺北：桂冠，2001.1），頁 71。

[13] 參考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7），頁 26-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上表可看出，其小說中之人物A皆透過了人物B擔負著某種傷害責損。人物B在小說之中，大部分不是小說中的重要角色，小說沒有對他們有太多描述。人物A則多半有或多或少的選擇權力，可見人物B他們只是扮演著幫助人物A犧牲自我的功能，是幫助人物A完成「承擔」此一功能的人物。雖然有時候人物B不止一人，但是他們的功能都是相同的，皆爲輔助人物。而人物A擔負之後，多有一對象人物C，他們是受到人物A此一行動影響的人。此對象可能只是事件外的一個旁觀者，也可能是事件關係人，或者是人物A本身。下表將列出人物A在承擔之後對情節發展所造成的影響。爲突顯人物A與人物C之間的關係，將在人物之後標明A和C的代號。

小說	人物 A 承擔後對事件的影響
〈賊〉	魯大個兒（A）承擔偷竊罪名被打，使真正的偷竊者狄三（C）悔悟，事件結束。
〈劊子手〉	莊稼漢子（A）殺了欺壓百姓的鄉董後自首被斬，引起傅二畜（C）等人的議論嘆息，但最後傅二畜還是吃下漢子死後的心臟。
〈紅燈籠〉	老舅（A）先爲救溺水孩童引發病症，後因甯家私藏秘方使病情加劇，「我」（C）因不忍而瘋狂。
〈出殃〉	三奶奶（A）被老爺枉誣偷人而選擇自殺，引起老爺誤會導致事件的徐三（C）先是難過，後又引起姦屍偷陪葬品的念頭。
〈鎖殼門〉	長春（A）遭到同族之大春殺害，爲了家族和諧，長春臨死保守兇手是誰的秘密。永春（C）卻因此爲尋求仇人而浪跡天涯多年。小說最後大春（C）老殘瘋癲，時時受良心折磨。而永春（C）也終於知道仇人是大春，才明白長春隱藏真相的用心。
〈鐵漿〉	孟昭有（A）爲標得官鹽而飲下滾燙鐵漿而亡，其子孟憲貴（C）因此獲利兩年後，無法阻擋火車通行家敗而終。
〈狼〉	大轂轆（A）因不受二嬸的色誘而被她誣陷糟蹋羊群，二叔便憤怒的辭退了大轂轆。大轂轆雖不辯駁張揚，但趁機抓姦，逼二嬸善待養子「我」（C），二嬸（C）也因此良心發現。
〈冷雨〉	三招姐（A）應母親要求偷麥子，結果反遭人玷汙，失貞的三招姐隱忍不說，不知情的母親（C）得到了麥子，還要求三招姐遵處女之風俗，三招姐無奈。
〈白墳〉	二叔（A）像個不負責任的長輩，總在外地。不照顧妻小、看丟了大侄子，也因此承受家族的責備、譏諷。小說後來「我」和家人（C）才知二叔是受人尊敬的愛國人士，秘密從事愛國活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偷穀賊〉	穀雨先是阻止姜麻子調戲駱大嫂，他（A）爲了守護駱大嫂（C）被姜麻子調戲的名節，忍受被姜麻子等人報復栽贓，遭到偷穀的侮辱打罵，堅持不說出秘密。傷心的駱大嫂（C）只能目送穀雨離開村子。
〈牧歌〉	大馬（A）因銀駒受到陷害，代表馬家入獄受刑。大馬馬奶奶（C）因而爲之殉情。弟弟二馬（C）雖免於牢刑，但在大馬將受斬刑之時，適時出現搭救。
〈破曉時分〉	徐周氏和戴姓商人（A）因巧合而捲入兇案，被誤認爲兇手。在衙門中兩人飽受冤刑，一番折騰後只得畫押。（非自願承擔）看到如此殘忍和欺騙的過程，使得新到衙門當差的「我」（C）膽顫心驚。

小說人物A透過了人物B擔負著某種傷害責損後，我們可從人物C看出來，這種承擔的行爲通常能夠表現出某種人際關係或價值。人物A受到傷害，並不是因爲人物A行不義之事遭受到因果報應，反而人物A是無辜的，有時甚至是遭受誣陷；人物A會對之承擔，通常是義理承擔，他們遵循傳統的義氣或道德，而一力擔負。承擔的結果，不是使他們遭到了肉體傷害，就是名譽尊嚴上的嚴重損傷，但是人物A通常會承擔下來，使事件有新的發展或者是結束。

三、〈賊〉和〈偷穀賊〉中的人物情操

我們暫且以其中兩篇小說：〈偷穀賊〉、〈賊〉來做詳細的說明。〈偷穀賊〉和〈賊〉是上表所列小說之中，在名稱、人物、情節發展、背景上相似度最高的兩篇小說。這兩篇小說有諸多重複，可見作者對此一典型的偏愛和代表性，因此以這兩篇小說爲探討重點。

〈偷穀賊〉與〈賊〉裡面的人物A同樣都生活在農村村落之中，地方發生的大小事，對每一位村民來說都是引人好奇圍觀的新聞。在貧窮且生活艱難的村落之中，村落中的富人總具有權威和財勢，同樣的他們都富甲一方但不仁德：〈賊〉的瓦房家在處理偷竊事件上有失厚道，〈偷穀賊〉裡的姜二麻子則等而下之，竟戲弄人妻。〈賊〉中的光棍魯大個兒因爲知道狄三需養一家老小，便義氣的擔起偷竊之罪；〈偷穀賊〉的穀雨憑著「理」字阻擋地主姜二麻子的姦行，又始終對駱大嫂保守著承諾，即使在被姜二麻子栽贓偷穀之時，堅持不願將三人這一段恩怨說出，守住駱大嫂的名節。也因此魯大個兒和穀雨都在承擔村人刑罰之後，只得離開了村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們同樣都無意辯解，也不會因爲自己的恩惠而想要他人感謝，離開村子無一言半語。作者有意發揚他們的承擔，是由於源自於內在的不忍人之心：

>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之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14]

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的重要論點。孟子強調人之四端是與生俱來，當人在面對一極端的倫理情境的時候，必然會無條件發揮作用。其行爲是出於內在的直覺，不是因爲有任何的利益好處，也並非想要得到名譽讚美，而是純粹善的發揮。這是身而爲人的基本質素，是先天就擁有的。

魯大個兒和穀雨的承擔使自己受到重刑，難道他們不明白那可能會招致何種後果嗎？〈賊〉透過小孩「我」的敘述，這麼說著：「果真是他（魯大個）偷了瓦房家的金鐲，我們就能看到這個大仇人被吊到樹上捱揍了——我們村上是這個規矩——或許他偷的是值錢東西，一定揍得更狠。」（頁22）表示魯大個兒的村中自有律法，這是連小孩都知道的事，所以魯大個兒絕非不知輕重。〈偷穀賊〉中也曾兩度提到一個不曾出場的人物「孫疤眼兒」，一次是穀雨說「大不了跟以前的孫疤眼兒一樣——地不准我種，更不讓我打，房子不讓我住！」（頁110），一次是由村中老人說「又是一個孫疤眼兒！」（頁115），這個陌生的名字雖僅在小說中短暫的出現兩次，但其實是藉此表示出以往就出現過以富欺貧之事，姜麻子害人早有前例可尋。作者隱隱的在小說中暗示，不管是魯大個兒或穀雨，他們其實都深知自己義氣承擔的後果。只偏偏狄三是個「全家都是病鬼」（頁27），孩子也「憐惜」（頁28）的孱弱之人、〈偷穀賊〉被調戲的駱大嫂是帶著不健康孩子的窮戶，他們除了拿命去犧牲之外，不可能從這些戶富的手下逃生，所以魯大個兒和穀雨面對了這樣的倫理情境，他們以善來主導了他們行爲，即使知道後果仍勇於承擔。

這正是一種對於自身所是的覺知，魯大個和穀雨不求感謝，瀟灑無言的離開，表示他們也自認爲「應當」如此。孟子之四端之說，關鍵的指出：「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不遵從良知之

[14] 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版，1997 年影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版論語注疏），卷 3，頁 65-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以在道德上是惡的，首先並不是因爲這樣的行爲對他人有害，而是由於這樣的行爲將自己降低到一個「非人」的水平，因而是對自己的人格的侮辱，是一種「自賊」的行爲。[15]因此雖然魯大個兒和穀雨的行爲是爲人奉獻，但根本來說是爲己，他們以行爲呼應了來自心靈深處的良知的呼喚，他們雖然卑微，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惡劣的環境與勢力對抗，但是卻以人性的光芒照耀自我的生命。因爲承擔使他們完成了自己，因爲這種追求並不是物質上的追求，他們已超過了物的價值，而是人本身靈性的展現，也是一種人格的完成。他們信奉著的道理，在事件的過程中因爲選擇承擔而完成，也等於是自我信仰的一種實踐。

如果這道德承擔太輕易、太輕鬆那麼也不能顯現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16]的道德意志力，表現儒家修身堅定、剛毅的信念。他們面對巨大的外在力量，一是環境上的窮困，一是不仁的地主。在鄉俗的空間中，不但他們自身沒有力量，也無法結合他人的力量。所以作者在描述上特別令人注意之處有兩個地方，一在於刑罰之時的描述、另一則是人物C的反應，在這兩篇小說裡就是狄三和駱大嫂的反應。

小說先是寫穀雨被「反剪著手，那麼大個頭，從上到下結結實實綁到馬樁上」（頁113），打到後來看到的是「穀雨血慘慘的腦袋歪在肩膀上，昏昏迷迷哼唧著」（頁116）就這樣的慘況，文字又描述大家議論紛紛，說不定穀雨有無偷穀，沒有人敢阻刑。只不過「村子上，人從四處聚攏來，一層層圍上。……樹上，草垛上，也都爬滿了人，大新年裡看會那樣擠」（頁113）。就連剛拉差回家的駱老大看著穀雨，還趁機「從脖頸上拿下土車辮子，橫折一個雙。很用不上勁兒，從人們腦袋頂上構著抽了穀雨」。至於魯大個兒則是吊在樹上，「上半身被吊走了形」（頁29）。先是抽打，昏死了再火燒，醒來了再打，打了後又燒，再打。同樣人們圍繞在四週觀刑，小孩「我」的描述是：「人們罵他，婦人唾沫到他身上……大人們這麼快活……我看他們沾沾自喜的樣子，倒是因爲眼前有個賊掉在這兒，他們自己不清白也顯得清白了。」（頁30）

魯大個兒和穀雨洞察了他人的不幸，給予關懷與憐憫，但並不止於同情而已。即使剛開始出手援救是一時的意氣之勇，但是行刑的慘烈，兩個硬漢子的剛強，「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的孤獨都突顯了良知的實踐需要持久的耐心與毅力。因爲這些刑戮和他人是如此殘酷，就算在行刑的過程中間，因爲受刑不住而坦承案情，恐怕也不會有人責備，但是受刑過程中魯大個兒和穀雨皆沉默

[15] 唐文明，《與命與人——原始儒家倫理精神與現代性問題》（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7），頁 237。

[16] 〈子罕第九〉，《論語》（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版，1997 年影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版論語注疏），卷 9，頁 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承受，這時的他們已不是爲了他人所受。透過冷酷受刑的過程，我們而能體會這不僅僅是兔死狐悲式的同情心所能承擔，反而是一種對自我的高貴肯定，是內在對於天命的回應。

跟隨著刑罰，作者安排了旁觀的人們，好看事的聚在一起。尤其是駱大，完全不知穀雨是爲了自己的妻子承擔罪行，猶得意洋洋於打了穀雨的事。人們不曉得他們的清白高尚，反而在旁加刑。突出了人們的無知、混沌和人性上卑劣殘忍的一面。再觀狄三和駱大嫂是受幫助的對象，但他們並不因爲事情受了頂替，感到逃過一劫的喜悅，反而自良心上受了莫大的懲罰和不安而哭泣、呼喊、顫抖。因爲承擔者的犧牲，體現了人性中高貴無私的珍貴處，同時也以此呼喚了他人良知的回應。而這才是魯大個兒和穀雨願意承擔傷害的基石，不管是自我或者他人，只要生而爲人都有使人尊重的質素。從狄三和駱大嫂反觀村民，「因爲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17]，才表露出了作者對於人類愚拙未明的悲憫。

透過肉體的苦刑與精神上的傷害承擔，作者表現了他的人性觀點。朱西甯採取如此的小說形式，和基督教的代贖（Atonement）觀念相近。代贖的起源，主要與舊約的獻祭（Sacrifice）有關。舊約的獻祭有贖罪的效果，祭祀的重點乃是流出沒有瑕疵之祭牲的血，並將它獻給神，可以由祭牲爲人先時所犯的罪贖罪。這些祭牲都是預表性的，事實上真正能把罪惡抹掉的，並非動物的血，而是耶穌基督的血。所以代贖是指基督代替人接受罪的刑罰，而在十架上捨身流血，祂的死乃是我們的救贖。由於神主動性的愛，神預備了基督代死此一和解的方法。基督的代死，一方面解除了神對人的憤怒，一方面也感動人們放下敵意，回轉歸神，使神和人復和。[18]

耶穌以「猶太人的王」的罪名釘上了十字架，在祂兩旁的，是因爲強盜之罪而上十字架的惡人。耶穌是無罪之人，而以肉身承擔了不義。祂早已預言要用自己的死亡，要以血洗淨世人的罪，故耶穌基督是代替世人而死。正如前所述魯大個兒和穀雨他們同樣都是無辜的，因爲他人而承擔罪惡；而他們以無罪之身承擔罪愆，其關鍵在於內在良知的道德抉擇與實踐。魯大個兒和穀雨都是

[17] 這是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個禱告詞。〈聖經・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 33-34：「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當下耶穌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祂的衣服。」

[18] 參考張麟至譯，巴刻（J.I.Packer）著，《簡明神學》（臺北：更新傳道會，2000.2）、趙中輝編，《英漢神學名詞辭典》（香港：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90）、楊牧谷編，《當代神學辭典（上）》（臺北：校園書房，1997）、空中神學院講義 http://www.sotaonline.net/notes/y104b501.pdf。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卑微的人，內在良知的照耀展現，使這些人物通過本身生存的侷限而在人格上有所不同。朱西甯實有意藉此將良知和上帝之聲相連。孟子把人性之善，看成是一超越性的存在，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天所命之。而此一天命的根源就是上帝。[19]魯大個兒和穀雨的行爲既然是遵循內在良知而來，也就是對於天命的回應，換句話說是上帝之愛的彰顯。如此，即使非信徒也有奉獻自我，代贖罪惡的可能。也因爲代贖，使得有罪之人逃避了刑辱的同時，使受幫助者受到良心的譴責而焦慮不安。而當明白承擔者的用心，領悟到人具有未實現的內在可能的時候，才能真正的感到慚愧或者良知的力量。[20]

亦如另一篇小說《鎖殼門》。大春不滿老五房老大長春介入四十畝田繼承權一事而懷恨在心，與五房的永春爭執。事情越演越烈，大春終至與五房家結仇，於是勾結了外路馬賊攻打自家族人老五房。然而計謀未果，反而大春自己被馬賊報復，遭馬賊劓刑，以刀穿耳釘綁在樹上。當長春發現慘叫哀絕的大春，事情已了然於心，急忙卸下他。但「不知是甚麼忽把大春激怒」（頁206），他狠狠擊打了長春的腦杓，更「在一個永世不可挽回的轉念間」（頁207），把刀尖刺進了長春脊背。

大春的心中充塞了憤怒與仇恨。被恨意掩蓋全部心靈的情況之下，在幾乎他自己也不可確然的血氣之中，大春殺了長春。一次次的事件後，無性靈反省的仇恨越滾越大，原本意圖自殺的大春，竟然會凶殘的把刀指 向長春。然而，那也只是一個「轉念」罷了。作者指出了人的盲動，表現人性的混沌與暗沉。但是，良知作爲一個本然的存在，在長春死後，大春那以往從未出現過的良知卻也開始運作，使他下半輩子盡受良心折磨瘋癲。

於是很顯然的，長春作爲一個承擔者的意義在此突顯了。長春先是不該死的人物，小說裡他總是寬和，人格上他有著仁德、正義的特質。小說一開始因爲「五」房長春挺身而出，把「二」奶奶的田判給了「二」腰子而非「十」爺家的惡霸大春。從人名的稱謂就暗示出長春如朱西甯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他可能是因爲看不慣，也可能是主持正義，幾乎是「多管閒事」的改變了原本可能的判決，而那並不一定關乎五房的事。這使他包含著後來願意選擇義氣承擔秘

[19] 正如朱西甯在一次訪談中所說：「我認為基督教是東方的，而且與中國文化非常貼近。耶穌基督就是地地道道的天人合一。」見李昂，〈在小說中記史——朱西甯訪問記〉，《書評書目》第16期（1974.8），頁115。

[20] 身為虔誠基督徒的朱西甯，即遵循著祖父及父親的道路，努力將基督教中國化，效力於宗教和民族文化兩者信仰的和諧。所以在小說中他將這兩者結合並不讓人覺得意外，而筆者以上所探討的重點則是朱西甯如何以小說形式結合兩者的問題。關於朱西甯信仰這方面的討論，見楊政源論文《家，太遠了——朱西甯的懷鄉小說研究》第三章第一節：「基督教中國化的尋求」。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密的那種人格特點。明明是凶死，可在長春的面孔上是「彷彿知足的跟這個陽世訣別」（頁208），彌留時還用盡力氣說自己被馬賊殺害。長春企圖以死結束仇恨，使家族和諧，可見胸懷的寬大。

馬賊報復大春，卻死了長春、大春該受到永春的尋仇，長春卻以死擔負了仇恨。長春以肉身承擔了大春之罪，其影響在大春也在永春，而在永春身上更能體現類似「代贖」之情節功能。

作者安排心心念念的要尋找仇家的永春，在尋仇近二十年後返家，竟愕然的從瘋癲且面目模糊的大春口中發現仇家是眼前不成人形的大春。長春的用意在於寬容，可是永春真能體會長春之用心，卻是在返鄉發現真相後的二十年。維持著長期的復仇，有家而不歸的永春，心中的仇恨必然深重，否則他不會任由已經瘋癲可憐的大春在祠堂之前。永春或能完全不理會大春，使大春一直受「天罰」，但經過二十年之後，不聞不問的永春還是再見了大春。「彷彿不能再禁止自己不憐憫」（頁220）的永春，使讀者發現，原來他不只是不願見，也是不敢見，這麼多年以來掙扎的是大春也是永春。永春無法讓寬恕的愛擴大到像長春那樣子，愛自己的仇敵，而仇恨與寬恕的拉鋸，竟然要二十年之久。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流之血儘管是要代替世人的，卻未必爲世人所知。這表示了完成「代贖」的不容易，真正體會並體現「代贖者」的用意亦非常困難。最後永春對大春受盡報應折磨憐憫，是他終於讓心中的善發揚，馴服並卸下仇恨，走向寬恕，而那才是長春「代贖」的意義。長春的「代贖」行爲，感動了永春放下敵意，聽從了良知之音。

耶穌在受刑之際，仍以痛極之肉身，爲無知的人們禱告，表現的正是愛與寬恕的精神。《狼》也透過承擔者大轂轆表現出寬恕的力量與人由惡向善提升的可能。一如司馬中原所說：

> 大轂轆捉姦捉雙，但他寬恕了姦夫淫婦，他同時也寬恕了世人，因世人在罪中軟弱如羊群。對於一個犯罪的婦人，『寬恕』與『愛』的行為就是對她軟弱的心靈施洗，使其恢復人性中的純愛。[21]

二嬸人盡可夫，並以極淫惡的言語污衊大轂轆，但在作者的安排下，大轂轆在小說中本就是能制服狡滑之狼的善牧者，他也以其正直與寬大的胸襟制服二嫂心中之狼。最後我們看到二嬸懺悔羞愧的淚水，見到她可悲但也軟弱，二嬸原來似狼實羊。

在朱西甯小說筆下的眾多承擔者都是凡人的面貌，但在承擔之際，他們心

[21] 司馬中原，〈試論朱西甯〉，朱西甯著，《狼》（臺北：皇冠 1978.6），頁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的善念與愛發揚光耀，而彰顯了神聖的品質。他以如此雷同於耶穌「代贖」之情節功能中強調了人心之超越性的可能。由人之內在而超越了身而爲人的凡俗性，強調人應該發揮人心中的靈性，體現天性。唐君毅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文提到：

> 中國思想雖謂：天心無所不在，神運無方，帝無常處，萬物皆能顯元亨利貞之德（即天之仁義禮智之德），然唯人能自覺此天道之元亨利貞之德，完成人之仁義禮智之德。……此點則又與基督教、回教，特重視人之精神，謂唯人為有靈性有自由意志，而最肖神之說相近。[22]

但是，唐君毅卻也說中國人之對天，與基督教對其上帝，最大的不同，即基督教特別重視上帝之超越性，而較輕忽其內在性，此點可由基督教重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之說證之。[23]可見，朱西甯是強調了儒家思想與基督教之共同處。他銜接了基督教的救贖理想與儒家的心性思考，使其對人物的內在性表現十分重視。由小說中人物的承擔功能，表現人在惡劣的命運以及環境之中，並非只能等待上帝藉由先知直接的啓示，忽略人於內在的力量。所以有魯大個兒和穀雨的義無反顧、長春與大轂轆的勇於擔負，這股力量不止是讓人物自己有了精神上的提升，同時也帶給他人啓悟。

但是，一如耶穌基督受難之時，未必能暮鼓晨鐘的敲醒每個人的心靈，依然不爲所動甚而對之嘲笑的人依舊，[24]小說中執行刑戮者或者是圍觀者還是在欲望或奸惡之中。雖在朱西甯的鄉土小說中多有人物A以肉體的受刑或者精神的斲傷發揮了承擔的功能，表現出類似代贖者的角色，但是凡人畢竟是凡人，小說中少數時候他們獻身的事物，並不一定具有絕對價值，如《鐵漿》的孟昭有的犧牲換來僅是孟憲貴的兩年富貴，隨後火車的通行使得富貴遠去，他的犧牲是賭意氣的結果，且有著不識時務的悲哀。不過他們的行爲，卻會引起讀者的慨歎，即使當其不具有絕對價值之時，仍能顯出人類自身力量的侷限以及蒙昧。尤其當承擔者的犧牲沒有喚起人物C的覺醒時，更是表現出如王德威所說

---

[22]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1969.5），頁 459。

[23]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1969.5），頁 458。

[24] 《聖經》提到耶穌在十字架時人們的諷刺。〈聖經・馬可福音〉第十五章 29-32：「從那裡經過的人辱罵他，搖著頭，說『咳！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祭司長和文士也是這樣戲弄他，彼此說：『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叫我們看見，就信了。』那和他同釘的人也是譏誚他。」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他小說中的僵局，混淆而非釐清人的道德視野即自我反省能力」[25]。以〈破曉時分〉來說，小說中的「我」縱然在行刑的過程中同情被刑的婦女和「姦夫」，一再的想要卸下這份黑心的工作，最後終還是做了僞證。小說的末尾這麼寫著：

> 心裡可很疑惑，說不出道理要不要幹下去；總要等等罷，不是才開頭嗎？跟在後面的還很多，拿不穩的。……恐怕我正是半生不熟的時候，彷彿這天色，這破曉時分，說夜不夜，說晝不晝，儘管匆匆間不會久留，可是等日出還須一段兒時辰——我是這樣子想。（頁304-305）

「我」因爲眼見地獄般的苦刑內心受到震顫，牽引出了惻隱之心，這不代表善的光亮會持續的燃燒。當「我」跪在衙門上，順口作了僞證，便足以代表內心的黑暗和動搖。小說家以充滿象徵性的破曉時分，表現了人的良知狀態。人性之善即使存在也不一定能夠發揚，如上引述孟子「凡有四端之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之語，孟子覺察出人的脆弱，表明了人儘管具有良知也不一定能夠實踐。凡人內在具有天命的神聖性品質，卻也時常被欲望遮蔽。除了「人皆有之」還要能進一步「擴而充之」，需要透過自我的覺知思考以及倫理修養，使善性充滿，才不會做出違背倫理道德之事。「說夜不夜，說晝不晝」表示了兩種可能，不然繼續留下以此牟利，否則遵從善性，離開幫兇者的角色；只是不知「我」之善心是否能堅定的運作，日出不知何時。人物C的反應常被描寫，和人物A相互觀照，除了有對比或是陪襯的效果，作者也訴說了人之行爲的總總可能。

對於人性可能之探索，是朱西甯鄉土小說的重要內涵。朱在小說中藉由人物A在事件上選擇承擔此一功能，發揮了他的人性觀點。在人物A和相關人物B以及C的關係中，他結合了宗教啓悟以及中國儒家人性之說，我們見到了在類似「代贖」行爲之下圖景，人的內在包含了人善性之發揚，脫離罪惡之道的可能，可是人類自身的愚昧侷限和脆弱也代表人的渺小和意志上的薄弱。於此，作者傳達出了尋求民族乃至於全人類的覺醒，以及對人之精神、意志向上攀升的企盼。所以我們已可看出，朱西甯的懷鄉之作與其說是在懷念一個具體的鄉土中國，不如說朱乃是藉由情節功能上的雷同，自其筆下的鄉土中國之人物內在，一次次傳達出對基督與儒家救人、救世之精神的渴求。對於一個離散者來

[25] 王德威，〈鄉愁的超越與困境——司馬中原與朱西甯的鄉土小說〉，《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國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6），頁 2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如果說懷舊之於未來是屬於消極的態度，朱西甯的「懷鄉小說」的精神則是積極的，他是以面對未來爲基礎，而表達出對人世的願望。

四、離散情結的揮發

陳芳明在〈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一文提到朱西甯：「歷史的洪流把他沖刷到這個島上時，漂泊的命運使他產生救贖的焦慮。身處歷史轉型時期，他並不袖手旁觀，而是投身介入。他的小說書寫，便是投入的最佳姿態；而他的技巧策略，便是重新挖掘歷史記憶。」[26]若說朱是重新挖掘歷史記憶，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補充說明，朱西甯對於儒家人格的展現、民族精神甚是人類整體精神提升的期盼，實不亞於實際歷史的書寫。所以我們也並不訝異他的作品：「幾乎全置於民族生存、繁衍、延續的大環境之下。與作品表達同時，在在不忘給人以環境中群性的束縛感，以及這一民族悠久歷史傳統的重量。」[27]因爲這是最能表現此一議題與內涵的場景。

關於其鄉土作品楊政源在其碩士論文《家，太遠了——朱西甯懷鄉小說研究》曾有過一番爬梳。其中有一獨到的見解，他觀察出和同時代一部分直接在小說中透露出想念故鄉的懷鄉作品相較，小說朱西甯鄉土小說筆下的故鄉已經與現實中的時空完全斷裂，不再有聯繫。之中的人物沒有懷鄉的言論，其內容像是「一個大陸人在臺寫出大陸題材的作品」。我們可從文本中聯繫到朱西甯故鄉的，只有文中的題材和語言，但這些卻是任何作家在任何地方都可寫的。例如一個大陸作家就可以在黃淮平原上寫出一樣的東西。故鄉不再只是緬思的對象，更是挖掘創作素材、馳騁文學想像的場域。讀者同時也卸去沉重的鄉愁包袱，而是「認識」「另一個」中國的故事，而不再「承擔」龐然巨大的「中國歷史」責任。[28]

在楊政源的論述中，他意指在朱西甯的懷鄉作品中，其時間和空間都移置了，不再有吶喊著國仇家恨的憤懣，而是把火氣收起來，訴說發生在中國的往日故事。不過，儘管在朱的作品表面上看來遠離了現實塵囂指向過往，但其實又晦澀的和現實相關。

朱西甯本人於一九九四年，曾發表〈豈與夏蟲語冰〉一文，抗議論者將他

[26] 陳芳明，〈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朱西甯著，《現在幾點鐘——朱西甯短篇小說精選》（臺北：麥田，2005.1.1），頁 18。
[27] 司馬中原，〈試論朱西甯〉，朱西甯著《狼》（臺北：皇冠，1978.6），頁 6。
[28] 楊政源，《家太遠了——朱西甯懷鄉小說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6），頁 111-11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定位在「懷舊文學」，而直言〈鐵漿〉、〈狼〉、〈白墳〉、〈紅燈籠〉中隱藏著對於現實批評的涵義，是對當前社會的一種寓言。

> 例如《鐵漿》的直言家天下的不得善終，不識潮流者不惟傷及己身，尤其禍延子孫。《狼》的直指執迷於嫡系己出之愚，乃至內鬥內行，外鬥外行之蠢；試請就你所知或許不詳的孫案拿來對照一下看看。《白墳》不只是直寫孫案，多少只是不很受形式或陋規所拘束的忠貞之士，備受逼迫乃至死而後仍不已的悲情，應也都同其運命罷。又如《紅燈籠》私權侵奪公權，誤人誤國誤文明。[29]

也就是說，就作者言，他筆下的懷舊並不真的懷舊，是藉由懷舊的表象，悄悄的在風聲鶴唳的五、六〇年代批判了臺灣現實。

然而這個方向的解讀，畢竟沒有像是朱西甯所期待的被進行，沒有人朝著這個方向研究，這樣詮釋方向有其困難。實在是作品中的中國，與現時的時空距離的太過遙遠了，遠得使這其中有太多的可能，而不一定朝著哪個解釋路徑才會合理。[30]若非作者自言，我們恐無法能夠斷定出其意圖。藉由楊政源之語來說，在朱西甯的筆下，故鄉真成了「『認識』『另一個』中國的故事」。

在某個層面上來說，這代表了和大陸故鄉之間的一種距離。在這和故鄉分離十年有餘的時空距離中，自然已經無法得知故鄉的樣貌了。加上在無法回到真實故鄉，或是得知訊息的情況下，還想要在這種距離斷裂中寫家鄉，不是要繼續的把回憶盡量如實的寫下去，就是要透過想像。而前者已經寫得太多了，《現代文學》的創刊就是對於這種回憶文學的一種反動；朱西甯顯然選擇的是後者。

在意識上擺蕩在眼前現實生活的土地和離開的故鄉之間，是離散者的特徵之一。採取故鄉故事來包裝眼前現實問題批判的作法，正象徵了原生地與遷移地之間相互接觸容納的第一步；儘管這個第一步的方式是相當隱晦曲折。但是筆者更願意將朱西甯訴說中國鄉土故事的小說，視爲是觀察在原生地大陸與遷移地臺灣兩者之擺盪的作品，它們並不一定是爲了批判現實的隱曲之作，也不

[29] 朱西甯，〈豈與夏蟲語冰〉，楊渡編，《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時報出版，1994.11），頁 96。原刊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4.1.3）。

[30] 黃錦樹在〈隱藏的教誨或釋意的迷途——朱西甯小說的詮釋問題〉一文提到了這除了是技術上的問題之外，尚且是敘事認同障礙的問題。見黃錦樹，〈隱藏的教誨或釋意的迷途——朱西甯小說的詮釋問題〉，朱西甯著，《破曉時分》（臺北：印刻出版社，2003.4），頁 9-1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定是全然爲了思念故土風光的懷鄉小說。

從人物塑造來看，朱的人性思考內涵具有結合著基督和儒家精神，可視爲漂泊命運的救贖之道。當人面對著漂泊無定的命運與變化無端的危厄之時，人如何維持生命的尊嚴，保持和頑強惡劣的外界環境對抗的意志力呢？這個思考結果，就作家個人而言是一個答案，也是對離散命運感到焦慮的精神寄託。

一如〈生活綫下〉蹬著三輪車在臺灣討生活的丁長發，其友人住在棺材店後院的小樓，當他每到此處，就有一種厭惡和恐懼。看到這個棺材，他的感覺是：「臺灣的棺材又小又醜，他沒見過死人裝進去是什麼樣子，但可以想得出，兩隻胳膊沒辦法放平，準得重疊在胸口上。憑這個，他就跟自己罰誓，在臺灣是死不得。」（頁141）死不得豈只是因爲棺材，更是離散者落葉歸根的願望，狹小的棺材一如讓人覺得侷促不安的臺灣。尤其是老實守分的丁長發在撿拾了巨額金錢之後，他雖因此幻想著自己能花用金錢的各種好處，但同時也恐懼行了虧心事的報應。而在他所能想到的報應，就是「注定非睡臺灣的棺材不可」或者是在「那麼大的海，海上翻船」而非其他，可見那對於丁長發來說正是最大的夢魘。每一次只要當丁長發克服了慾望，例如拒絕了尋妓的誘惑，他便有了一些勝利的快樂和驕傲，便能「解除了許多的又是相同的恐懼」：

> 他連睡午覺都會夢見他睡了臺灣棺材，或者回大陸的途中，船在海上沉了——就如同那次吳淞口的江亞輪。那當兒，他在上海外灘碼頭幹苦力，也不知搬運了多少死屍送到桃源路的寧波會館去。他現在就會老做搬運死屍的惡夢。搬著搬著，屍首堆裡就有他老婆，或者小二，或者才斷奶的小五，甚至於他自己。（頁 149）

能夠以善行代替或大或小的惡念，得到心靈上的平靜，是這個老實的好人所能得到的微微報償。雖然小說中不曾描述丁長發如何到達臺灣，但從死亡的恐懼如影隨形的糾纏著他這一點，亦可推知他對於逃亡以及命運漂泊的不安心理和沉重覆壓。儘管眼前在臺灣過著養活一家大小的踏實生活，可是死亡的陰影籠罩著，死亡者或許是身旁至親，或許正是他自己。由於命運無法被掌握，人因此而產生漂流不定乃至於死亡的恐懼惶惑，若要自其中獲得精神的安慰，也只能轉求善爲慎行，而因此得到短暫的救贖。人可以抗拒邪惡誘惑，遵循應走的道路，才能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不過善行卻也未必能真正的保證善報。在丁長發因爲拾金不昧而被登報表揚的同時，極其諷刺的，丁之友人莊五也欺騙丁長發的身分證以刊登不名譽廣告獲利。莊五雖和丁爲老鄉，反而是以各種手段來得到利益，也因此過得比丁

臺灣文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得安逸。作者表示了善行不見得會有實際報償，而是做給良心看，給天看，就此在心靈上也通向了救贖之路。

另一方面，參照同一時期中朱西甯筆下的臺灣，相對於大陸的遼遠，生活環境的困苦艱辛與不易，臺灣顯得侷促狹窄，雖然日漸擁有現代化的生活，但是心靈卻走入荒原。

尤其朱西甯這三本鄉土小說代表作《鐵漿》、《狼》及《破曉時分》，創作的時間背景是五〇年代中期至六〇年代中期的臺灣。而從五〇年代一直到七〇年代這段期間，正是臺灣社會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渡，邁向現代化社會的期間。然而現代化帶來快速與便捷，也帶來功利與算計。所以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其實也對人類之良知帶來了危機。「現代性就是人類逼迫上帝退位的過程，良知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徹底的內在化翻轉」[31]。對中國人來說，良知體現的方法之一，是對長幼、夫婦、父子等人倫關係圓滿所做的努力。然而在尚未全面現代化農村、小市鎮中，反而較能夠體現出人類良知的微弱光亮。

寫於一九五八年的〈偶〉中即透露了現代生活的倫理問題。從農業社會漸漸過渡到工業社會，在分工日細的商業生活之中，小家庭的家庭型態應運而生，但也帶來家庭的問題或者人格的扭曲。〈偶〉的主人翁老老闆，一個以裁縫爲業的鰥夫，兒子開店娶妻另居它處，老老闆則獨居在裁縫店裡。在孤獨寂寞的夜晚，失家的老老闆嗅聞著女顧客換下的洋裝，懷抱著木頭裸體模特兒入睡。小說以「偶」爲名，除了指人偶模特兒之外，也指顧客夫妻、兒子夫妻。以他們的「偶」反襯了鰥夫的「單」。同時以老老闆的瘸子形象反映出心靈上的殘缺不完整，此時的「偶」，則有微諷之意。

一九六二年〈福成白鐵號〉，以在現代化下受到衝擊的產業「福成白鐵號」爲描寫對象。因爲白鐵號的沒落，媳婦遂以出賣肉體養活家人。媳婦、丈夫、公公、小叔，一家人相互怨懟，各有心事，互不言語。一九六五年〈本日陰雨〉以城市爲背景。踩著三寸金蓮的傴僂老婦十天一輪流的穿越街巷，當著大房與二房兒子的「食客」，即使是淋漓的雨天仍心酸的被驅來趕去。最後死了，老大老二夫妻搶奪老母親那一副金耳環取利，壓榨她直到最後一刻。

這三篇小說同樣都以臺灣爲背景，地點是小城鎮或者都市。自己的家人尚且不能夠彼此關懷、和睦相處，甚至是功利算計的對象，遑論沒有血緣關係的鄰居、陌生人。人際關係的冷漠使人憂愁，取利的狠毒也令人心寒，彷彿只剩

[31] 唐文明，《與命與人——原始儒家倫理精神與現代性問題》（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7），頁 2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下赤裸裸的慾望。反觀其他小說如〈賊〉、〈偷穀賊〉、〈螺車上〉等見義勇爲乃至於古道熱腸到管閒事的人物，相距實在不啻千里之遠。

現代化流放了人的靈魂，此外城市也使人善於遺忘。就反共堡壘臺灣而言，在生活中忘卻了警覺性，尤使離散者不可忍受。〈屠狗記〉譏諷的以語言如此描述：

> 戰機不在河的對岸，在海的對岸。
>
> 構築這些工事的那個時期，戰機就好像是在河對岸一樣近。十多年下來，戰機一直遠在海的對岸罷？現在則已從人們的感覺滑向另一個遠方了。
>
> 遠去了，可以發誓地說，真的遠去了。
>
> 而在人們的感覺上，人們的夢裡，僅僅散發著、飄落著麻痺之菌——而不是菌子。
>
> 從這一座鋼筋混凝土的菌子頂上，看得到遠處那一綹綹的河霧，晨夕都是 那樣。
>
> 一如一抹而下那片高爾夫球地上，那些被菌在脂肪下熱病著的人們，擎著甚麼，揹著甚麼；而那菌子頂上十不全兒這個拾字紙的傢伙，也擎著甚麼，揹著甚麼，晨夕都是那樣。（頁 52）

戰機一直遠在對岸，但是人們卻認爲它已經滑向遠方。作者要強調，戰事並非真的遠去而只是在感覺上遠去，這種感覺從何而來？則是因爲「麻痺」。朱西甯尖銳的形容麻痺是菌。養在其形狀如同菌子的鋼筋混凝土的建築物中。發胖的人們，悠閒打著高爾夫；因爲菌已經穿越脂肪，在其下發著熱病，所以肥胖怠惰的豈止是肉體，也是意志。舊日的大兵十不全兒已經老弱，也只能以拾荒糊口罷了。從昔日的反共文學，到當日的城市空間描述，這段批判文字實在尖刻不過。這裡彷彿也在詢問著：面對了如此鬆弛了的，日漸散漫出現代化惡性的島嶼，要怎麼樣才能遂其心願理想？

朱西甯在《破曉時分》後一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貓》（1966），其中主角少女蔡麗麗，自大陸跟隨母親來臺，儘管在臺有著優渥的物質生活，但在失愛的家庭裡撫平不了她童年眼見殘酷戰事中父親死亡的傷痛。又此後五年，一九七〇年《畫夢記》出版。當其時大陸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正如火如荼。作家在小說中寫著：「在這個物質文明極度猖狂的動盪時代，唯一能超渡人類歸位和引升的，只有中國獨特的純熟、完整、智慧的哲學思想」（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7）。但能夠擔負這個任務的，在當時的大陸來說是不可能的了，也就是說，臺灣自然有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條件和義務。然而，如同《貓》，在四個女孩爲主要章節內容的小說《畫夢記》裏，這些在臺灣成長的女孩家庭都有所殘缺，其中三個失去母親，一個失去父親。因爲家庭的殘缺，使得小說的女孩們分別都有某種愛的缺乏，她們雖然聰明，具有高超的天賦，但也很容易會迷失自我。一方面朱西甯對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有著自傲和期盼，但另一方面卻又由人物來象徵，即使有著深厚的先天條件，但是在失去典範的環境與滿是誘惑的現代化社會中，在臺灣的人們是否能夠擔負起這個任務，還是讓人感到迷惑。

朱西甯曾在與李昂訪談中表示，雖然有許多的作品都寫中國鄉土，但是：

> 「農村生活我過得很少。直接參與而像個農民的，只有抗戰時期逃難在自己農莊上住了二、三年。然後就是在游擊區的農村裡，跑來跑去的讀書。」
>
> 「我家庭雖然西化得早，還有上一代掌舵壓住了根。……那幾年農村生活使我覺得真正過著屬於中國人的生活，也從農村中得到豐富的民族遺產。」
>
> 「然而對於農民生活的珍惜，喜愛，並不是說都一視同仁的認為美好。一樣的，我也十分知道其中有太多的殘缺和不合時宜。我的這一類作品中常含有批評意味是不是？」
>
> 「是可以看出來。」年輕訪問者點點頭。「這類作品都是您旅臺時期所寫，是否和遠離後感到懷鄉有關？」
>
> 「我想是的」[32]

朱西甯筆下雖常有農村鄉土的寫作，但事實上是「少數實際經驗加上大量想像經驗來寫」[33]，其想像的成分大於真實生活的成分。儘管懷鄉是朱西甯此階段的小說之「成分」之一，可朱既然是要寫大陸的鄉土生活，爲何不選擇他所成長的真實故鄉來寫，爲何要選擇他僅有短暫經驗的農村來寫？關鍵在於朱西甯在訪談中所透露，農村中保有豐富的民族遺產，「是真正過著屬於中國人的生活的」。什麼才是朱西甯所認爲真正中國人的呢？朱西甯這些農村鄉土中

[32] 李昂，〈在小說中記史——朱西甯訪問記〉，《書評書目》，第 16 期（1974.8），頁 112。

[33] 李昂，〈在小說中記史——朱西甯訪問記〉，《書評書目》，第 16 期（1974.8），頁 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小說人物角色，做了回答。此正表現出他所心繫的民族精神之理想所在。

若朱西甯對當時臺灣社會批判的重點是在於人際冷漠喪失良心，以及人們沉溺慾望或是逸樂，朱的鄉土中國實際上已經脫離了現實中國的描寫便不只是懷舊而已，也是離散者把靈魂寄託在一精神的中國之中。

朱西甯企圖勾勒出他理想中堅毅的中國人形象。不管苦難是屬於肉體的或精神的，不管苦難是由惡行所遭致還是枉屈所受的，在這些艱辛的苦痛之中仍能夠掙扎、前進、進而成長的中國民族形象。儘管中國人有著愚騃、僵固、守舊的一面，他卻同時也相信他們具有向上翻昇的特質，這使他們能夠遵循天道義理而非利益。朱西甯小說經過情節功能上的重複、提出，使此成爲了中國民族群體所擁有的共同特點。我們因此和艱困的在中國土地上生存的人們同在一起，感受到精神上豐厚的歷史沉積感。如此書寫給予了民族精神重量，不管是奮鬥的過程，還是願意承擔他人苦難的品格、中國人民之間無私的愛，這都統攝了我們的歷史記憶，而對我們的民族有一種驕傲感、飽滿感。既然身體無法在那片土地上，但是在精神與之相互接合，共同擁有一種特質。而此亦對存在於逆境之中，待反攻中國大陸但實際上又不能與之接合的人們格外重要。

大陸與臺灣，雖小說書寫的空間不同，但在原生地和遷移地之間，或許距離並沒有那麼遙遠。沒有眼前，就沒有過去。在作家眼中，正是面對了現實臺灣的缺無或不完美，而在以往尚未現代化的農村中國去尋找理想上的可能。

五、結語

在《狼》、《鐵漿》、《破曉時分》這三本小說集中，多篇小說呈現出：「人物A承擔了人物B的枉屈污賴或刑罰，致使人物C得利或反省等反應」的情節模式。人物A作爲一名承擔者，在小說中除了發揮了「承擔」的情節功能推動情節進行外，也扮演了類似基督「代贖」者的角色。這一份「代贖」的內在精神，正與儒家良知之說相互契合。朱西甯從這些人物角色的關係之中，反覆速描中國人的道德意志力在惡劣的環境中抗爭、掙扎以及努力的圖景，顯露出對於儒家理想人格的企盼以及基督救贖精神的渴求。

這一份心靈的圖景，或是自覺的、或是潛意識的運作。在朱西甯眼前的臺灣，已經對於反共戰鬥的鬆弛懈怠，現代化進入使得人們疏離功利，逐漸遠離理想中的中國人形象，此外異地文化又無法完全讓人精神放鬆，現實環境充滿無奈，卻也只能如此。離散情結的揮發，使他將理想企盼和情感焦慮寄放在小說，化爲文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懷鄉文學的書寫本身就是一種焦慮。若不是離開，又怎會有回憶？一旦寫作，便表示故鄉正在遠離。生活於臺灣，現實的茫然使他思索，朱西甯轉而從他的作品中探索屬於中國人的精神，朱西甯的懷鄉小說其實正在離開故鄉，走向對移居地的批判與思考的路上。

（責任校對：洪依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專書

朱西甯，《狼》（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6）。

朱西甯，《畫夢記》（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7）。

朱西甯，《貓》（臺北：三三書坊，1990.8）。

朱西甯，《鐵漿》（臺北：印刻出版社，2003.4）。

朱西甯，《破曉時分》（臺北：印刻出版社，2003.4）。

朱西甯，《現在幾點鐘——朱西甯短篇小說精選》（臺北：麥田，2005.1.1）。

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版，1997年影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版論語注疏），卷3。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1969.5）。

唐文明，《與命與人——原始儒家倫理精神與現代性問題》（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7）。

畢然、郭金華譯、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

張麟至譯，巴刻（J.I.PACKER）著，《簡明神學》（臺北：更新傳道會，《聖經・新約全書》和合本（國際基甸會中華民國總會，1988）。

賈放譯，弗拉基米爾・亞可夫列維奇・普羅普著，《故事形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11）。

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臺灣文學五十年》，臺北：九歌，1998.10。

齊邦媛，《千年之淚》，臺北：爾雅，1990.7。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200》（臺北：麥田，2003）。

劉豫譯，羅伯特・休斯（Robert Scholess）著，《文學結構主義》（臺北：桂冠，1994）。

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7）。

羅鋼、劉象愚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0）。

二、報刊雜誌

李昂，〈在小說中記史——朱西甯訪問記〉，《書評書目》，第16期（197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大春，〈從講古、聊天到祈禱——追思朱西甯先生的一篇小說報告〉，《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七期（1998.5），頁80-83。

張大春，〈被忘卻的記憶者——朱西甯的小說語言與知識企圖〉，《中國時報》（1998.3.26），第四十三版。

三、論文

（一）一般論文

王德威，〈鄉愁的超越與困境——司馬中原與朱西甯的鄉土小說〉，《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國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6）。

王德威，〈畫夢紀——朱西甯小說藝術與歷史意識〉，於朱西甯著《現代幾點鐘：朱西甯短篇小說精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1.1）。

司馬中原，〈試論朱西甯〉，收錄於朱西甯《狼》（臺北：皇冠，1978.6）。

柯慶明，〈論朱西甯的一本短篇小說集：鐵漿〉，《境界的再生》（臺北：幼獅1977.5）。

侯健，〈朱西甯的《破曉時分》〉，鄭明娳編《當代臺灣評論大系3・小說批評卷》（臺北：中正書局1998.9）。

陳芳明，〈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收錄於朱西甯《現在幾點鐘——朱西甯短篇小說精選》（臺北：麥田，2005.1.1）。

張素貞，〈試探朱西甯小說的主題意識〉，《細讀現代小說》（臺北：東大圖書，1996.2）。

黃錦樹，〈隱藏的教誨或釋意的迷途——朱西甯小說的詮釋問題〉，收錄於朱西甯《破曉時分》（臺北：印刻出版社，2003.4）。

（二）學位論文

江衍宜，《「細述」衷情——朱西甯小說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論，2001.6）。

楊政源，《家太遠了——朱西甯懷鄉小說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6）。

四、會議論文

朱西甯，〈豈與夏蟲語冰〉，楊渡編，《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時報，1994.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alysis of Characters and Emotion Diaspora in Si-ning Ju's Novels: *Wolf, Molten Iron*, and *Time of Dawn*

Ru-Chi, Hou *

Abstract

Due to Si-ning Ju's diaspora experience of coming to Taiwan from China, his three combined novels, "*Wolf*", "*Molten Iron* " and *Time of Dawn*",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is experience.

Although every novel's characters are different, there is always a character, A, that portray the narrative function. Character A shoulders the punishment and humiliation in the novel, in turn serve the force to continue the story. Upo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meaning, it is playing the role of Jesus Christ, the atonement. This atonement is very similar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hrough these character's relations, Si-ning Ju describe the Chinese ethics against the hostile environment, struggle and hard work to a unseen future, and stress the Chinese people's kind and persistent character. Besides displaying Ju's thirst of Confucian cause and Jesus Christ's redemption spirit, it also comforts the anxiety of his own diaspora destiny.

Keywords：Si-ning Ju, characters, diaspora, narrative function

* Part-tim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